

城市化、居住分异与教育空间生产

——0-3岁儿童照顾空间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张文馨

摘要:在全面二孩生育新政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特别是双职工家庭面临着低龄儿童照顾时间上的困境。回顾建国以来的儿童早期照顾模式,从建国初期至今经历了规模兴建单位托儿所、家庭照料,再到当下市场化托育服务机构三种不同的社会空间组织模式。本文尝试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阐释儿童早期照料模式的变迁,以空间解读时间,以揭示0-3岁儿童照顾模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社会空间结构变迁而变迁的内在逻辑。城市化进程不仅导致了居住分异,也造成了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教育资源的分层与教育空间的资本化趋势;社会转型期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影响下,儿童早期照顾公共空间在这种空间变迁过程中被挤出了公共服务空间的范畴,当下儿童照顾与科学育儿、精细化照顾观念的联盟,使空间资本化在城市化过程中进一步催化了居住的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并且再生产了基础教育空间的不平等。

关键词:城市化;居住分异;教育空间生产;儿童照顾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9.24.013

一、问题提出:0-3岁儿童照顾遭遇空间困境

自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新政以来,学界对该政策的影响与成效保持着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聚焦于政策直接利益相关者——处于育龄期女性的生育意愿。在以往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与冲突”的研究中,都会聚焦于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其作为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与养育的参与者。最新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60.7%的一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而不愿意生二孩,也正是因为无法找到低龄儿童的照护人,有28.1%的一孩母亲认为如果生育二孩会“影响工作和事业发展”而没有生育意愿,或生育意愿较低,究其根本原因与前者同源。^[1]当下,照顾婴幼儿特别是已生育二孩的核心家庭,在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的匮乏时期,遭遇越来越多的“不能”与不可协调的照顾困境,“婴幼儿及儿童早期的照护”困境成为生育新政持续显现成效的第一道生育屏障。^[2]这不禁让人思考,该如何深入解释当下遭遇的公共托育缺失以及曾经遍布城乡的托儿所

的消失呢?儿童照顾方式的变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主动调整还是一种被动的策略性行动?这些将是本文进一步讨论的。

二、文献综述

近年,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3]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学界在分析儿童照顾变迁和照顾危机形成原因上,基本沿着如下几个解释路径和分析框架进行。

(一)国家福利体制和政策的发展分析路径

众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家庭政策的缺失与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儿童早期照顾的困境。马春华从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出发,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福利体制的构建“更加偏向自由主义模式”,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消费开支,为了经济发展可以削减的开支。^[4]邓锁基于照顾的概念,认为当下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仍然是以家庭补偿为导向,社会福利的社会化趋势不仅意味着国家福利开支的减少,更体现为国

张文馨/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 (常德 415000)

家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退出,当经济成本和情感成本几乎完全转移到家庭私领域,儿童照顾面临照顾体制和家庭形态变迁的双重冲击。^[5]刘中一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出发,通过对不同国家在儿童照顾方面的政府角色的比较,认为主要有三种观点或理论流派: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国家干涉主义理论和家庭支持主义理论;并对我国当下政府在儿童照顾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提出了相应建议。^[6]杨菊华则直接聚焦托育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从理论到现实依据剖析了改革的思路,搭建了托育服务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的框架。^[7]

(二)代际资源流动分析路径

其次是基于代际关系理论的分析。陈映芳就认为,现有福利制度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中对成年子女的各种援助实际上侵蚀了老年人自身的福利资源。^[8]刘精明将儿童培养能力与家庭资源相联系,认为家庭影响以及资源与机会的优势传承,都离不开对家庭资源的利用。^[9]马春华通过对比国家在老年人和儿童身上的投入之后,认为国家对儿童的投入不足,资源再分配在代际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这种制度给初为人父母的青年带来沉重的负担。^[10]刘中一回顾了儿童照顾的变迁与政策调整,指出儿童照顾一直被视为家庭内部责任,即使父母缺席,也多仰赖家庭内资源解决。^[11]

(三)社会性别角色理论与育儿观念变迁的分析路径

基于社会性别角色理论,抚育儿童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母亲的职责,而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下,职业女性明显存在“抚育学龄前儿女的责任与其工作角色的责任之间的冲突”。^[12]而女性作为母亲和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是近代的事。^[13]正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使妇女也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要劳动力。^[14]张航空通过对儿童照顾嬗变的实证研究发现已有男性开始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15]同时,在一孩生育政策影响下,“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念使得女性“以期获得更多的育儿知识”,力求自身做个“专家型”母亲的诉求直接导致了职业女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学习与实践“科学育儿”的知识。^[16]

前述三种分析路径都是基于福利制度层面,讨论公共福利资源配置缺失对儿童照护的影响。这与在公共养老资源的相关分析类似——“制度结构论

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结构论,即从社会制度结构单一视角来分析公共福利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17]以往也有研究提到了在集体照顾的市场化替代公共托育后,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儿童照顾和早期教育结果上的不平等。而且“家庭结构发生变迁或者贫困都极易导致儿童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将其归因为“照顾体制和家庭形态变迁的双重冲击”^[18]实际上忽视了从空间视角——与照顾资源的接近性、公共空间资源的分配和控制,以及基于居住空间分异情形下形成的社会分层对儿童照顾进行制度政治经济分析。

三、城市化进程中儿童照顾空间的嬗变

城市空间一方面是社会变迁的发生场所,另一方面又蕴藏着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分层和利益争夺的社会问题,更是“城市中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的承载空间,^[19]可以概括为“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20]本文从社会空间视角阐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经验,以为解决儿童照顾危机和困境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如果站在社会空间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育儿资源的匮乏,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各区域基础资源的不平衡,即空间分析揭示出了地理不平衡发展,正如苏贾指出的:“区域性的不充分发展,是延伸的抑或扩大的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1]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拓展开新的空间,制造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在商业空间、行政空间等不同空间集聚的同时,人的生活空间也日益被割裂,不仅时间日渐碎片化,空间也逐渐碎片化,而这种因资本形成的空间集聚对于城市化发展来说是必需的。传统制度结构论对0-3岁儿童公共托育福利资源配置长期缺位的解释,忽略了空间结构的影响。

社会学家厄里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22]然而,“日常生活与城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产品和生产,通过这两者而占据着一个空间”。^[23]基于社会空间的视角,儿童照顾在国家的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变迁中,一方面呈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社会群体中的社会互动,儿童与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变迁;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个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复杂融合,这些都与社会空间重组密切联系,“时空变化构

成了一切社会变化的最基础的层面”，即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型背景下原有的社会空间被重新划分，这种划分“并非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是一种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空间分化，一种制度化的空间隔离。”^[24]我们长久地忽视了时空变化是包括儿童照顾在内的个体生活变化的基础性原因，当被卷入了空间分化与隔离之中时，就迫切需要从空间角度构建新的儿童照顾变迁的分析框架。

本文调查的企业S,1967年-1994年间为国有中药厂,1970年正式挂牌,这时为了给广大职工生活提供服务,1979年开办了厂区的托儿所兼幼儿园。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第二年,这一年,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活力,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程。

(一)“单位制”下的大院生活与育儿空间政治：托儿所的兴起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即工作单位(working unit)的略称,是指“给城市居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政府和公共机关等”,^[25]包括“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研究所、文化团体、党政机关”。^[26]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的关键环节就是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体制的建立,城市建设围绕着“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这样一种集体化的生产空间中,单位空间以土地划拨的方式被无偿使用;“通过单位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控制与分配,由此创造了一个以‘单位’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27]其中,住宅实施的是一种由国家来统筹统建统分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和福利性制度,居民对住房的拥有完全靠社会再分配体系的运作。^[28]在单位制的社会空间结构下,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总称,同时“被国家赋予了经济和行政权力,将生产、消费、资源分配广泛纳入,个人无法从单位体制之外获得资源”。^[29]这种意义上的捆绑是政治化的,社会公共资源的控制分配以“单位”为基本单位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合体的单位空间,个体被隐匿到单位的背后。单位制下的大院日常生活并非现在意义上的个体日常生活,一切实践也就随之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中,成为保障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保障性的生活空间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在城市物理空间上,单位往往通

过“围墙”来实现其空间的围合性、封闭性、完整性,并以“院”的形式来组织单位内部的居住设施、生活设施及各项福利设施。^[30]当社会意识到女性也是劳动力的一部分,儿童照顾便成为社会生产的影响因素,当女性走进生产场域时,儿童照顾也一并从家庭空间转移到单位空间,型构了那个时期特有的集体儿童照顾的公共育儿空间。

相关史料记载了那个时期托儿所几个关键的时空发展节点:

首先是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中首先设立,然后逐步推广”,由此拉开了单位幼儿园发展的序幕。由于未对入园入托儿童的年龄做严格规定,加上空间资源的限制,特别是乡村中人民公社办园,很多都是腾挪出的自家房屋,由群众捐出各种必要设施和玩具,托儿所与幼儿园也未做明确意义上的空间区分。自此,既可以将这种集体儿童照顾模式看作是通过“国家-集体-家庭”的结合形成家国一体的父爱主义福利模式。^[31]从空间视角而言,也可看成是一种组织中的空间治理模式,国家-集体-家庭三者被统一在“单位大院”空间中。除了单位之外,许多城市的街道社区也可获得国家补贴兴办托幼机构。作为一种空间治理,名义上是为妇女解放的集体儿童照顾空间的生产,但实则是为“社会主义生产战略目标”服务,并且从起初的半日制改为了整日制。^[32]“大跃进”生产时期,儿童照顾者在政治话语型塑下充当了革命战友的角色,帮助参与劳动的妇女照顾孩子,家庭空间因此“没有一个闲人”。直到第二个阶段,中央才开始重视和强调幼儿照顾过程中不仅有“养”还有“教”。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资源有限,“城市建设选择了职、住接近为优的原则”,单位成为实施这一原则的最佳空间组织。^[33]导致了计划体制时代儿童照顾资源的获得也并非完全均等,“它与就业身份以及居住地区都有一定关联”,^[34]而这种社会空间上的特征在土地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更加剧了儿童照顾资源获得上的空间不平等。

1952年3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试行《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次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1955年中央教育部又规定:“今后几年内,幼儿园的发展,以工矿企业、机关、

团体、群众白办为主。”^[35]随后一年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来临,需要解放一切可以解放的力量加入到劳动中,农村人民公社或互助组织办的幼儿园和街道幼儿园也出现了很大发展的局面。1958-1959年之际,随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而来的幼儿教育大发展。^[36]“办好托儿所、幼儿园,是当前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37]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生产任务又重的历史条件下,用最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自建幼儿园(托儿所)完成社会生产任务,催生了为解放妇女而进行辅助其日常生活中集体式育儿的国家政治需求。正如齐美尔指出的“康德曾经把空间界定为‘呆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也是社会意义上的空间,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38]“从城市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单位社会的特征表现为城市空间主要被不同的单位分割为一个个内部生产、生活设施相对齐全的单元。”^[39]如果是几个闲散的妇女聚在一起照顾儿童,相互间的互动关系仅仅停留在邻里关系的层面,然而把儿童聚集、减少一对一的照顾者、统一固定的照顾空间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较之前不同的公共社会空间。

儿童照顾空间脱离家庭内部向外延生的动力机制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生产政治化型塑了当时儿童照顾的空间政治。时空规划为集体劳动最大化提供了可能,生产生活空间上的功能集聚规划换取了生产上时间的投入,这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生产效率较低的工业化初期是切实有效的统筹策略。城市空间的分化也随之出现,单位大院用地空间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单位制”的城市居住空间内,城市内部没有因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区隔”,而“存在着因单位不同导致的居住等级差异”。^[40]此时的居住等级差异也就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住区更新过程、居住空间分异以及现在公立幼儿园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等级差异的根源。

(二)城市空间变迁下的单位消解与居住分异:托儿所的消逝

2016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城市3岁以下儿童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而未入托育机构的主要原因中,有30.1%的被调查家庭是因为“附近没有接收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机构”,有

21.6%则是因为费用太高。^[41]关于公益性质的公办托儿所的消失过程的描述在很多相关研究中都出现过,其消失的时间段判断上也大致一致:在2004-2011年间,公办的托儿机构比例逐渐锐减,到2010年托儿所已基本消失。^{[42][43]}在对这一公共社会空间消失的原因的考察,不同学者大概有以下几个出发点:首先,论述较多的是改革之后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儿童托育设施和服务。据统计,公办幼儿园从1980年的87.50%下降到2012年的27.41;民办幼儿园从1995年的11.52%上升到2012年的68.73%。其次,也有学者从福利体制嬗变的角度,认为“中国福利体制的构建属于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更加偏向自由主义模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养儿育女的责任都重新回归家庭,托幼服务等都需要青年夫妇依靠市场解决”。^[44]儿童托幼服务的市场供需矛盾成为解释儿童照顾危机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但随着儿童照顾对生育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其开始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社会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国家开始意识到国家应该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随着这些社会制度的变迁,儿童照顾的公共空间的逐渐减少,其与家庭对集体儿童照顾服务的需求逐渐上升呈现出明显的冲突态势。空间的变迁则隐匿在需求冲突的背后,从表面的“事实”出发去描述看到的现象,托儿所的消失看似是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然而,中国当下构建新时期的儿童早期托育服务发展需要更多理论的支撑,否则难以从儿童早期照顾危机的根本症结出发,系统化地构建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更大程度地将人口战略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投资行为而非资源的消费行为。

1984年后,国企开始“放权让利”、“政企分开”、“盈亏包干”、“承包经营”的改革,中央政府开始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的股份制试点改革。本文调查的S厂也于1985年从生产型转为生产经营型,为企业发展带来了第一次发展契机。1989年S厂与中国药材公司联营,开始了第二次的发展,幼儿园就是在这一年停办的,从开办到停办,整十年时间。停办后,幼儿园房子的空地用来建设职工住宅,如今还在作为新职工的宿舍。

据当时S厂幼儿园的J老师回忆:当年共有6名老师,27名儿童,为混龄管理,没有分班,入读条

件为父母一方为厂在职工人或干部。S企业也在1994年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第一批改制的国有企业,1997年再次进行股份制改造,2001年组建股份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2005年S企业从地方性企业升级为全国性大型企业集团,厂区从市区搬至新区,面积扩大了,市区只留有总部管理部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单位大院”的空间结构,也没有再开办幼儿园或者托儿所,职工家属入园也就依据现在的基础教育政策——公办园为就近入园。

当将企业的发展过程与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放在同一框架下相互链接时,“单位”空间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居住的政治化空间,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前,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供给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无偿划拨,实行的是无偿、无限期和不允许流转的使用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开启了空间的市场化,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相关的法规无不表明,土地也像其他商品一样,进入流通领域,并获得了制度保障。

在国有企业单位的空间使用权被确立之后,单位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和利益整体的意义日益突出。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为了单位利益的最大化,各单位纷纷采取了各种空间实践行动。这样,在现实生活中,空间也已经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了市场。但直至1993年中共中央明确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住房改革才进入实质性的突破阶段。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正式发布,提出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的旧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才正式开始,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2号),至此开始“停止住房实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住房市场化由此全而展开。”^[45]随着单位制改革和住房改革的同步进行,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逐渐弱化,与单位剥离,居民不再集中居住。“住房改革首先是将以往的单位公房出售给单位职工。只有那些在体制内核心部门工作的人,才有可能购得位于核心地带的原本隶属于这些核心部门的

公有住房”。^[46]在对S企业退休干部处长的访谈中很明显提到了这一点。

“当时正在进行房改,我们厂是效益比较好的单位,所有很多职工房改前已分配了住房,而之前没有分配住房的,厂里出钱在附近购买了房子再按政策让职工低价购买。(在同一个小区吗?)当然不是啦,一共有三个小区,部长级别以上的干部是比较好的,跟厂长住一个小区,然后是科级干部在稍微差一点的小区,最后是一般工人。这都是因为我们厂效益好,那些不好的(单位)都不会管(职工的居住)了,没有(住房)就没有了,除非他自己有钱去买。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住的那么集中了,大家分散在城区里。幼儿园就没有必要了,大家不住厂里(宿舍)了,那就按规定就近找幼儿园了。或者夫妻两个另一方的单位还有幼儿园的,就转过去那边。像石油公司,他们一直都住的很集中,幼儿园一直都在办。但是托班很早就不能办了,只有幼儿园。还有就像我们买的是我爱人他们单位那个房子,虽然沿街,但在市中心,当时总共就花了2万块,什么都很方便,幼儿园、菜市场、医院、小学中学统统都在周边。”

——对S企业退休干部Z处长的访谈

居住分异在这个时期开始慢慢形成,不同阶层的住区在第一次住房改革中因单位的行政级别、经营效益等因素产生差异,单位内部职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居住区的空间差异与不平等。不仅仅是地方,全国各地情形大多如此,“居民跨越传统单位居住区的迁居行为开始大量出现。”^[47]虽然居住选择上看似比之前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可选择的范围还是受限于单位和自身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因素。“基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而非单位归属差异)的居住分异现象开始出现。”^[48]“生产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业的发展,并通过劳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化直接参与城市社会地理的重构”。^[49]优质单位在原计划经济时期相关的基础资源配套齐全,即每一个城区的学校、医院、机关单位在城市空间中的布局也相对集中。显然不愿意离开原来住区的职工或居民迫于无奈迁居他处,在各种机制的合力作用下,被挤出了原有生活空间,在住房市场化发展的带动下及居住空间分异的同时,各级各类托儿所在迅速减少,企业将这些服务功能转嫁出去,但由于居住分散,不利于形成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市场;同

时,迁离原住区的居民本身就是处于中下阶层,而他们重新安置的区域在当时的城市建设条件下空间设施并不完善。最终,不论是从空间资源配置上还是从时空成本的优化上,家庭又重新成为了儿童照顾的归宿。

近年来,3岁前儿童的教育主要由民办早教机构承担,养育主要由家庭负担。依托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开办的托儿所寥寥无几,真正的公办托育服务严重萎缩,而目前由市场提供0-3岁儿童白天照料的比例仅有3.9%。^[50]0-3岁儿童照顾市场空白的出现——公共资源消失,单位分化,居住分异,家国分离,家庭的个体化阻碍了低龄幼儿公共照顾服务的继续,出现时空断裂,新的住宅区可能规划新的幼儿园,也可能并没有考虑幼儿园的配套,而托儿所,大部分家庭都能通过家庭内部找到替代资源,一旦这种家庭内的替代资源减少,则核心家庭必然面临更加艰巨的育儿困境。

将儿童照顾空间的变迁放置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影响下的城市化进程中,与由此引起的城市空间变迁进行时间轴的重叠比对,两个社会空间相关的制度变革引发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变迁,进而带来一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子女离开父母,搬入新家,组建自己独立的家庭。”^[51]很显然,从儿童照顾的市场化机构的组织形式来看,如果单一的从空间组织自身的变革来分析3岁以下儿童早期照顾公共空间的逐渐消失,“其结果是未能敏锐地洞察构成社会空间统一体的统一性和矛盾性综合特征”,^[52]那么,也不能辩证地决定生产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空间的统一性。^[53]哈维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一方面资本积累导致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分布,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导致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在同一个地方的大量集中,形成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54]儿童早期照顾空间结构的变迁,正是与社会结构以及阶层(级)冲突具有同源性(距离托儿所/幼儿园的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的一致性导致了进一步的居住空间分异),并且在居住空间分异的过程中被一再强化。

(三)居住分异下的生活方式变革与教育空间生产:“托儿所”的空间重构

从规模式兴建单位内托儿所,到家庭内照顾,再到当下的家政公司、托幼早教机构,且三种儿童照顾

模式在时间轴上又有重叠,替代程度与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实则是资源配置的空间再分配。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面临儿童早期照顾的空间困境并不是照顾儿童的这个生活容器本身存在困境,而是指一种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人们通过何种行为方式构建出儿童早期照顾场所这一种人类行为演化的产物的缺失。“社会空间是一被建构,源于生活本身内在各种条件转型而产生的社会构造”,^[55]由此虽然家庭空间仍算是社会空间中的一种,但是一旦缺乏了照顾儿童的要件——照顾行为的承担者以及相应的组织活动,便在功能上不能兼容儿童照顾。外在的形象虽然还是“家庭”这一社会内容,但由于缺乏儿童照顾组织结构的存在,而出现所谓的儿童照顾的社会空间困境,进一步影响了生育意愿,特别是当职业女性面临蜡烛两头燃的情境,便难于填补这个社会空间的结构缝隙。当儿童早期照顾的活动从被个体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公共的、集体性的活动,它就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育儿观念的变迁,资本开始进入幼儿早期教育市场——并不是幼儿照顾市场——在大量受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与教育资本化的双向催生下,早教逐渐融入到中产阶级父母的儿童照顾方式中,于是,儿童照顾也不再仅仅是满足底线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开始需要有质量的服务,对照顾服务提供者要求提高,专业化的育婴服务逐渐出现在市场中,但是相对应的,服务质量与价格成正比,一线城市的专业育婴师工资几乎等同于一个白领的工资,大量无法支付这个价格的父母并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要求,去雇佣那些价格低廉但是服务质量较差的照顾者。

住房改革对家庭内部的影响是基于家庭成员居住选择行为结果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的考察。从中观层面来看,新的住区更新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也有可能引起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调,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对公共空间资源的购买并因此加以垄断,使得公共空间被私有化或出现萎缩,以及在新区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亲资本倾向所致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等。^[56]已有研究者关注到了居住方式与公共基础教育之间的微妙关系,“学区房”市场价格过高等社会现象屡屡发生,在当下面对“教育焦虑集体无意识”的家长们,开发商也常以“匹配优质学

校资源”作为楼盘营销广告刺激购房者的购买欲望,在“制造焦虑”和“贩卖解药”之间,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儿童照顾由于隐退到了家庭内部,在公共领域长期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因而当中的国家责任很少被提及。

在哈维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中,空间成为资本积累化解危机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场域,城市空间被普遍物化,空间已成为商品。城市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建构(built environment),这种环境的生产与建构过程基于资本主义条件,既是资本控制与作用的结果,又是资本本身发展所需的人文物质景观为适应资本再生产的后果。^[57]教育空间也在这样的意图中被生产出来,成为新的利润工厂,并与低收入者绝缘。显然,有关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并非聚焦或没有直接回答导致儿童早期照顾困境问题的原因,但都指出了居住与公共资源之间的空间关系(在此把公立托儿所、幼儿园归属于为公共基础教育资源)——当教育资源的获取机制与居住地、户籍捆绑在一起时(即所谓的就近入学、划片学区等概念的出现),学者的焦点便落在了城市居住的空间结构与教育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上,揭示出居住区空间结构的各种现象是“社会等级结构的外在体现”^{[58][59][60]},其实质是“人们对不同类型资源进行竞争的结果”。^[61]在住房商品化、土地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市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既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与权力主体,不论是自主选择居住地还是公共政策引导下的资源配置,都将影响家庭中子代教育的获得。^[62]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维持了原有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继而再生产了教育不平等。学者陆铭证实了我国城市教育资源的“资本化”的存在,并且论证了就近入学反而加剧了因住区分割和受教育不均等现象和居民通过居住地实现教育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63]学者王振坡在对天津市的基础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教育制度背景、居民自由流动、同群效应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都是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关键因素,同时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发展。^[64]与此同时,人口密度加大,却没有及时进行公共教育的规划,导致公共教育资源分布越来越不公平,基础教育市场化、资本化。照顾的商业化服务虽然扩展了照顾服务的市场,且增加了儿童抚育工作由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女性来承担,产生了阶层

效应,“对于较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女性而言,市场化照顾可能是确保就业的无奈选择,反过来加重了这些家庭的经济负担,并导致儿童照顾和早期教育结果上的不平等。”^{[65][66][67]}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较高的优势阶层中,并不存在儿童早期照顾的困境,其集中汇聚了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有多项服务类型可选择,于是在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下,形成了城市核心区域的新住宅、老住宅以及配套齐全的高端住宅区等空间资源的叠加。

当下一些一线城市地区开始意识到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无法找到有资质的保姆,也不认同隔代的抚养方式,受到“教育”融入“养育”的育儿观念影响,于是率先开办了高端的私营的盈利性托育机构,成为了托育服务的主要提供方。这种早教机构不断向下一级的城市空间扩张。“平均每个城市都拥有百余家早教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甚至超过了几百家。”^[68]根据资本市场对0-3岁儿童照顾市场需求的调研,目前,全国已有六家全日制0-3岁儿童托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获取了风险投资,儿童照顾空间在资本的扶持下迅速重构了全新的儿童集体照顾的空间与教育空间。有的机构位于城市空间地理位置较优越的地段,交通便利,一年全日托的收入在一线城市可以达到16万元,二线城市也超过10万元。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层白领将近一年的薪资水平,很显然并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家庭能够承受的。

当儿童照顾空间搭了教育空间的便车,通过科学育儿的话语,描绘各种“赢在起跑线”的美好愿景,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城市空间中流行着“消费即养育,消费即教育”的话语,既可以看作是教育空间的过程,也是教育空间生产的结果。因此导致即使有较多资源的家庭,在0-3岁儿童照顾问题上仍然是焦虑的。除了照顾,增加了教育意味着在日常生活空间的路径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目的场所,势必消耗更多资源——经济、时间、人力、空间资源。更有的家庭不仅仅是奔波于一家教育机构,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3岁之后的各类教育空间的碎片式分布,即便在现代高速快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辅助下,个人生活仍被多点的生活动线与在途时间消磨殆尽而呈现出儿童照顾危机——仅仅靠单个人辅助育儿的时代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家庭是一个团队式的合作照顾

模式，渴望更多地获取城市公共资源对抗空间上的支离破碎。中国的城市住区更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体现为“由生产型城市服务转向消费型城市的服务”，^[69]由此忽略了弱势群体的真正空间需要，少数人从空间生产中获利而再生产了城市空间上的不平等。那些能享受到社区资源、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的住区本身缺乏的并不是更多同质资源的叠加，而是异质资源之间的互补性质；相反，那些原本就缺失这些空间优势的区域，在当下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就近入学挂钩的局面下，很难有所突破截取更多的城市空间资源。一旦这些住区的居民无法从家庭内部获得资源辅助，便会立即陷入困境之中。“不同家庭之间使用托育服务的差异被不断拉大，社会弱势群体、非国有单位人员的子女很难享受到公共托育资源。”^[70]政策实施对象在空间上不被纳入体系中，儿童照顾的空间不平等将会进一步加剧。看似公平的“就近入学”制度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的资本化，进一步加深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教育质量空间溢出价格导致了因收入不同的教育资源可获得性不均衡。^[71]新的居住空间分异也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调，^[72]由于私人资本的进入，对空间资源购买形成垄断，公共空间在不断被私有化中而萎缩，使得公共资源配置让位于更具有经济效益的商业项目。

四、儿童照顾空间嬗变的解释框架构建

儿童照顾空间变迁实则是一种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的映射，在解释儿童照顾空间变迁和所出现的空间断裂时，将其链接国家宏观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空间结构变革，构建解释框架（如图1），将照顾与教育的二分、早期教育公共服务化与商品化之争、住房市场化与教育资本化等等社会现象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勾连。在聚焦儿童早期照顾空间的历史变迁的同时，试图回答儿童早期照顾空间变迁如何受到来自社会分层、居住分异的影响，逐步资本化，同时又进一步成为维护社会分层的工具，再生产了早期儿童照顾的空间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个体化家庭成为中国模式本土化的诠释的同时，从社会空间视角对儿童照顾的变迁进行解释可见其本质是土地制度资本化影响下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的纵向延伸。

处于这样的空间变迁中的儿童照顾方式的选择

者——儿童的父亲与母亲，在结构作用下其生与育随之二分，留守儿童问题便是生育二分下的时代产物。在儿童照顾空间的生产中，父母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空间中的行动者，取而代之的是第三方儿童照顾者。儿童照顾空间也因照顾者不再是生者，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服务性质的具有特殊社会关系的新型生活空间。儿童照顾空间已经不仅仅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多出了很多发展意义上的需求。低龄儿童在限制照顾者行为（低龄儿童只对特定范围的事物和动作有所认知）的同时，也被照顾者的行为所生产——成为接受过早期教育的儿童。儿童照顾空间嬗变的解释框架实则是找出了不同维度社会空间结构之间的介质和媒介，进而影响空间中的行动者，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再生产了新的社会空间及其相匹配的社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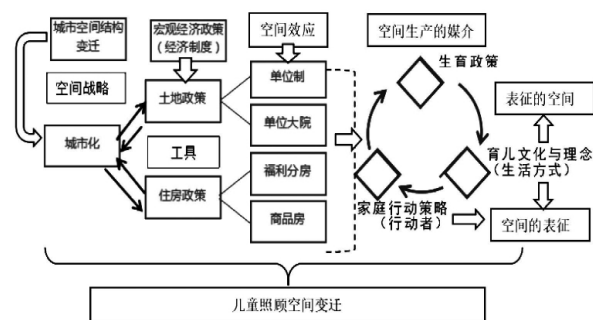


图1 儿童照顾空间嬗变的解释框架

* 此图根据前述相关内容绘制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时期已经不再适用曾经的以单位为单位的生活、生产、政治、消费等融合式的城市空间结构。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居住空间分异，城市化的发展，每个新的住区就由政府包办建立一所独立的托儿所也已是不可能。

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空间被商品化，城市空间被空间投资者视为一种可供资本积累的交换价值；“政府则将其视为一种集交换价值（土地财政）与符号价值于一身的共同体”，^[73]将廉价的劳动力从便宜的住区吸引到昂贵地价的空间中参与生产实现这种城市功能上的“交换”，但由于收入仍然无法支撑在中心区域的生活，进而导致不断加剧的居住分异，以及城市空间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断博弈，很难出让任何空间资本；

另一方面，仍以过去的单位空间概念已经不具备描述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了，也就无法复刻

曾经的单位托儿所的儿童照顾空间模式,住区与生产区的割裂也是现代生产空间的重要特征,空间的同质性基础上各个功能上的独立与分化虽提升了效率,但也入侵了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当空间的隔离不再是围墙而是距离与阶层化,空间碎片化也就导致了个人时间的碎片化与压缩;各种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在成为居民的空间补偿方式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真正的受益者却已不再是城市生活的缔造者——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老旧社区被逐出到了城市的边缘,不但,市区了原有的空间资源,反而面临自身资源的严重匮乏,城市的边缘住区并不是没有儿童照顾需求,而是看不到被需要照顾的儿童——他们被留守在了更远的家中。

学者孙立平曾使用“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互动空间”两个概念工具来分析中国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在改革前的中国,除家庭中的‘自然生活’之外,几乎全部的社会性活动领域均处于国家的垄断之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莫不如此”。^[74]当国家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和几乎全部活动空间时,一个人要首先获取城市的户

口,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其次成为城市某单位中的一份子,才能被纳入这个总体性体制,这意味着公有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学和就业、粮食和稀缺的副食品的定量供应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资源的获得。可见,教育是在改革过程中从一个被控制的资源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然而,显而易见的也是,在这种资源状态转变过程中,有一些教育空间和资源,如儿童早期照顾的空间虽不再被控制,但是也没有自由流动,而是转而由其他资源——祖辈照顾替代了,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四二一结构(四个老人,两夫妻,一个孩子)使得祖辈照顾成为可能,这一平衡却恰好在二孩政策到来时被打破了。改变生活,然而,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75]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2017年度一般项目“‘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劳动参与及工作-家庭平衡机制研究”(17YBA314);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2019年度一般项目“城市双薪核心家庭0-3岁婴幼儿照顾方式及公共托育服务需求研究”(XSP19YBZ099)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南钢)

参考文献

- [1][41]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开展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
- [2]李希如.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3_1646380.html.
- [3]杨菊华.三岁以下托育服务的现状与对策[N].福建日报,2017-10-01.
- [4][10][34][44]马春华.重构国家和青年家庭之间的契约:儿童养育责任的集体分担[J].中国青年研究,2015,(4):66-75.
- [5][18][65]邓锁.从家庭补偿到社会照顾: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路径分析[J].社会建设,2016,(2):28-36.
- [6][11]刘中一.国家责任与政府角色——儿童照顾的变迁与政策调整[J].学术论坛,2018,(5):111-116.
- [7][42]杨菊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8,(9):94-97.
- [8]陈映芳.如何认识今天的家庭危机.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7).
- [9]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8,(5):115.
- [12][13]杨菊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3).
- [14][16][31][66]佟新,杭苏红.学龄前儿童托育模式的转型与工作着的母亲.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1):75-79.
- [15][50]张航空.儿童照料延续与嬗变与我国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J].学前教育研究,2016,(9):14,20.
- [17]马玉娜,顾佳峰.县际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研究——兼论空间与制度结构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2015,(4).
- [19]张京祥,吴缚龙,马润潮.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J].城市规划,2006,(6):55-60.
- [20]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13,(3).
- [21][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7,124,160.
- [22][英]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布莱恩特纳主编:Blackwell社会学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 [23][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
- [24]景天魁.时空社会学: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J].人文杂志,2013,(7).
- [25]柴彦威.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J].地理研究,1996,(1).
- [26]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1).
- [27][29][30][69][73]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 [28]边燕杰.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J].社会学研究,1996,(1).
- [32][35][36]王卉,许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托儿所、幼儿园的改革与发展[J].北京党史,2011,(2).

- [33][40]周岚.单位大院的变迁[J].理论界,2010,(1).
- [37]人民公社经济系.如何办好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和幼儿园[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9,(1).
- [38][德]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59.
- [39][45]方长春.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教育获得:基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J].教育学报,2011,(6).
- [43][68][70]刘中一.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J].湖南社会科学,2017,(5):53-57.
- [46]方长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J].学术月刊,2014,(1).
- [47][48][56][72]方长春.从住区内过滤到住区间过滤:单位制消解与城市居住空间变迁[J].人文杂志,2011,(6):138,140,141,143.
- [49][52]吴启灿,任东明,杨荫凯等.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层次[J].人文地理,2000,(2).
- [51]杨菊华,何焰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39.
- [53]E.Soja, A.Soja.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J].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5, 70 (2);L·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 1985:207-224.
- [54]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London:Arnold,1973.
- [55]吴启灿,任东明,杨荫凯等.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层次[J].人文地理,2000,(3).
- [57]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8][61][62]方长春.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教育获得:基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J].教育学报,2011,(6):119-125.
- [59]张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居住空间分异[J].经济研究导刊,2013,(36).
- [60]王歆,李沫燃,任书庆.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新疆S市城市居住空间分异[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5,(5).
- [63]陆铭.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2010,(12).
- [64][71]王振坡,梅林,王丽艳.基础教育资源资本化及均衡布局对策研究:以天津为例[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7):100.
- [67]Cook, Sarah, & Dong, Xiao-yuan ". Harsh Choices: Chinese 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conom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1(4): 947-965.
- [74]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探索,1993,(1).
- [75]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UK&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91.

**Urbanizatio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ce Production of Education:
An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Spatial Change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in China**

Zhang Wenxin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 increasing number of dual-families are in a dilemma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This article review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social spatial changes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 state childhood care center, domestic childhood care by family members or nursery and business institution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cademy. Firs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se spatial chang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which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daily life in modern China; Secondly, The public space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has been almost disappe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replaced by commercial space, which implies the inequality in terms of children's access to early services. Third, the inequality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hildhood care resource re-created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by the space capitalization.

Keywords: urbanizatio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education space production, early-children care